

略论西夏的宗教信仰

张瑞敏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作为一个多民族王朝,西夏也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的国度。党项人在最初是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巫术流行。西夏建国后,受周边各个国家的影响,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成为西夏最主要的宗教。但同时,在西夏境内,道教也一直流传不息。西夏形成了以佛教为主,佛教与道教,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并产生了自己异常绚烂的文化。

关键词: 西夏;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原始宗教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111(2010)05-0197-02

西夏,中国11世纪到13世纪的帝国,在中古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它统一了西北广袤的土地,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西夏既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也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的国度。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佛教逐渐居于主要地位。西夏亦形成了以佛教为主,佛教、道教和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

1 西夏的原始宗教

党项人早期生活在黄河九曲的山谷草原地带,那里既有广阔的草原和雄伟的雪山,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以狩猎、游牧为主的族人们,既要与凶猛恶兽搏斗,又要与恶劣的天气搏斗,同时还有各种天灾人祸,“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1]。生产和社会的落后以及自然条件的局限,使人们对于天地、风雨、雷电等自然条件产生信仰和敬畏,以求其能降福和保佑。这就是党项先民们早期的自然崇拜。

随着社会的逐步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人们对于自然及其变化也了解了更多,对自然的崇拜也转向了对那些依附在自然物之体上的神灵的信仰和崇拜。《宋史·夏国传》载党项人“笃信机鬼,尚诅祝……”^[2]鬼神崇拜在党项族的传统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党项人的心目中,鬼神无处不在,凡人尚未认识的事物,皆归于鬼神。在西夏人的意识中,鬼神是对立的二者,神为善,鬼为恶。为了驱除恶鬼,西夏人就对恶鬼进行巫术诅咒,甚至人的病也要用巫者来驱鬼治病,“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3]。在战时,巫人们的作用就更大了,“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脾骨;二擲筮,擲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4]。

自然崇拜、鬼神信仰及巫术在西夏党项民族发展初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充当了

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2 西夏的道教

西夏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王朝,也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的国度,西夏也有道教的流传,《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天一贵神”和“天官贵神”,这都是道教的神祇。^[5]由于我的学识有限,且刚进入这一领域,关于道教的知识亦有限的很,所以以下的文字是在韩小忙老师的专著《西夏道教初探》的帮助下、参考下完成的。

通过阅读老师的著作,我了解到西夏既有灿烂的佛教文化,亦有道教的文化。元昊太子宁明也向道士学习道教:(元昊)凡七娶……五曰野利氏……生三子,曰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6]。过去的文献对于西夏道教的记载少之又少,然而随着西夏《天盛律令》的公布和译释,使更多的西夏学研究者掌握了有关道教的资料,加深了对它的认识。西夏政府在中央设道士功德司,统理全国的道教事务。西夏的道士同僧人一样,是西夏社会的寄生阶层,他们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权。道士不负担摊派的杂事,不纳税;道士(尤其有官品者)犯罪后,可以减免罪刑,可以官品抵当,可以不受黥刑;道观的环境受到法律的保护,等等。由此不难看出,西夏道士的优厚待遇,亦说明了西夏对道教的重视程度。^[7]《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1《为僧道修寺庙门》中,罗列了13种(计14卷)供道士童子出家变道用的道教经籍,即:1.《太上黄□□□经》一卷;2.《太上老子消灾经》一卷;3.《太上北斗延生经》一卷;4.《太上灵宝度理无上阴经》一卷;5.《至分金刚经》一卷;6.《太上老(子)说天生阴经》一卷;7.《太上天堂护卫经》一卷;8.《太上老子说上东斗经》一卷;9.《太上南斗六司延寿妙经》一卷;10.《黄帝内景经》一卷;11.《黄帝阴符经》一卷;12.《太上元始天尊说十为一为大消灾神咒经》一卷;13.《太上灵宝九真妙戒金篆九幽拔罪阴经》一卷。^[8]由此可以看出道教典籍的丰富。此外,西夏道教还拥有绘画艺术,如《炽盛光佛图》,《玄武大帝图》,《相面图》等等。西夏道教典籍和绘画的存在证明了西夏道教信仰的事实,但是和佛教比起来,它的影响还远在佛教之下。

3 西夏的佛教

唐初党项各部落相继归顺唐朝,并被赐以李姓,后来由于吐蕃势力强大,党项不堪其压迫,不断内迁。在内迁以后,党项族迅速走向文明。在接受中原礼教的同时,佛教在西夏社会很快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并且西夏统治者率先接受佛教,又更进一步地推动它的发展,使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服务。

西夏佛教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首先是赎经和译经。在西夏佛教史上,赎经、译经和印经是一项前后连续、紧密衔接的活动。^[10]西夏的佛事活动,做早见于记载的为宋景德四年(1007年)西夏党项族首领德明的母亲“罔氏薨……及葬,请修供五台山十寺,乃遣閤门祗候袁瑀为致祭使,护送所供物至山”^[11]。其后,德明便派使臣去宋朝,乞求宋朝赐佛经。之后,西夏统治者不断从宋朝赎取佛经,并展开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据文献记载,西夏的赎经主要集中在建国前后的40余年中,主要的有6次:(1)李德明时期(1031年);(2)元昊时期(1035年);(3)谅祚时期(1055年);(4)谅祚时期(1058年);(5)谅祚时期(1062年);(6)秉常时期(1073年)。佛经已经取得,但要在不懂汉文的群众中发展佛教,只有汉文佛经是不行的,西夏文字创造不久,大规模译经就开始了。北京图书馆保存的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明经》前有一幅木刻版译经图,详细描述了译经场的工作情况。^[12]佛经译出后,又用西夏文刻印传播。这一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在西夏底层群众当中的传播。

其次是西夏统治者大力修建佛寺。元昊在立国之初,就广泛搜集舍利,并大兴土木,建佛舍利塔。^[13]元昊又兴建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到毅宗谅祚时,其母后没藏氏十分好佛,并于西夏天祐垂圣元年兴建著名的承天寺,历时近六年才建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后继者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在位前期,两代太后梁氏均为佛教的推崇者。乾顺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由皇帝、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重修凉州护国寺通塔及寺庙,完工后立碑赞庆。此碑即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它是西夏留存至今的重要的石刻。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西夏建国初期规模宏大的修建寺庙活动,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西夏佛教的兴盛。

第三,西夏佛教的兴盛还表现在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和享受的权利上。佛教在西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封号体系,对后世影响很大。西夏佛教封号制度中最高的师号是“帝师”。以前都认为帝师是从元朝开始的,但目前从文献资料中已发现的西夏的帝师已有五位,这一发现改写了中国佛教史上关于帝师的记录。^[14]其它封号还有国师、德师、大师、法师。西夏对僧人还授予官位,实行赐衣制度,被赐衣的僧人有很高的地位。西夏的僧人是社会的寄生阶层,他们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权。僧人不负担摊派的杂事,不纳税;僧人(尤其有官品者)犯罪候,可以减免罪刑,可以用

官品抵当,可以不受黥刑;寺院的环境亦要受到法律的保护,等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西夏僧人的优厚待遇,同时也说明了西夏对佛教的重视程度。^[15]

在西夏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在西夏的土地上更加兴旺,译经事业在西夏一代蓬勃发展,为我国佛教文化宝库增加了许多重要文献,使之更加丰富多彩。特别值得提出,西夏首创的帝师制度,对元代佛教的发展以及对少数民族信仰佛教地区的治理都有巨大影响。

西夏王朝是一个实行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多民族的土壤也使佛教和道教在其土地上生根发芽,并结出优良的果实。西夏统治者需要宗教为其服务,维护封建统治;宗教在统治者的庇佑下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宗教和政治的结合也为西夏产生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成为历史上的一朵奇葩。

注释:

(1)《旧唐书·党项羌传》

(2)(3)(4)(11)《宋史·夏国传上》

(5)史金波《西夏社会》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49页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二

(7)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8)文中所述经典,因资料有限,参考《西夏道教初探》

(9)本节参考了李华瑞《论儒学与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西夏学》第一辑,2006年10月

(10)张践《中国全史·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

(12)同⑩,第231页

(13)同⑤,第549页

(14)同⑤,第580页

(15)韩小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所反映的西夏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4)

(张瑞敏(1986-)女,河南郑州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史)